論　　著

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 *

楊　佳　嫻 **

摘　　要

謝冰瑩是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中少數具有真正軍伍經驗者，前線服務經驗成為她的創作源頭之一。身為時代新女性，她不僅為爭取婚戀與就學自由而離家，甚至參與了素來被認為是男性專屬的軍隊，視民族國家大責為己任，以「女兵」形象長久地留在文學史上。本文討論謝氏

* 本研究課題曾在 2016 年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的香港文學節的研討會上發表初步構想，講稿收錄於文學節論稿彙編，共 3366 字，本文則是在當時的構想上擴充、加深，目前字數規模為該講稿的六倍以上。特此說明。此外，感謝幾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對於如何修改以及相關議題的思考，不僅指出原稿中的舛漏之處，還提供了極為具體的資料和建議。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北伐期間作為北伐正規軍隊的一員而寫下的《從軍日記》、自行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而寫下的《新從軍日記》,以及出版於兩次前線服務之間、帶有自傳性質的《一個女兵的自傳》。

女性從軍或上前線服務,是否就意味著女性地位的提高?軍隊作為與外界隔離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通過一致、重複且集體的作息、單一權威的管控、預先安排的生活行程、服裝與身體的管訓等策略,對成員實施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使之成為服從且融入機構內的一員,對女兵也不例外。然而,接受了同樣訓練後,女兵仍被認定應當從事宣撫、護理的工作,而非前線作戰,擬男化的軍隊訓練無法改寫性別分工,甚至可以說,女兵是在公領域延續了女性在私領域的角色,是家務勞動的公共化。

由於強烈認同軍人形象、嚮往殺敵報國,謝冰瑩帶有自傳性質的軍旅寫作中,「女」的生理身份幾乎為「兵」的自我鍛造所壓倒,一切被劃歸為「女」的元素,都在成為「兵」的前提下,應當去之而後快,愛欲的身體和愛國的身體被視為互斥。同時,女性加入軍隊此一陽剛領域,不只在日常生活上遭遇困難,體力與健康的差異更使得「女兵」自覺矮了「兵」一截。

女性從軍,究竟是解放還是受規訓?歷經過「女」與「兵」的種種糾葛,謝冰瑩渴望去「女」成「兵」,實際上,「女」性特質該不該保留,端視其是否能在戰爭中被工具化。最後,她還是肯認了與「兵」仍有差異的「女兵」身分。

關鍵詞:謝冰瑩、女兵、全控機構、性別意識、北伐、抗戰

一、前　言

謝冰瑩(1906-2000)在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中以軍伍經驗知名，她參與過 1927 年的北伐，也於 1937 年蘆溝橋事變後組織「湖南戰地婦女服務團」開往前線服務；前者是作爲正規軍人，後者則是服務性質。謝冰瑩很以實際上過戰場自傲，從軍經驗也成爲她的豐沛創作源頭之一，留下《從軍日記》等多部第一手見聞寫作，且早早就被翻譯爲數國語言，流傳海外。[1]

軍隊通常被視爲男性絕對領域，強調集體行動、泯滅個人色彩、需耗費大量身體勞動力、生死不操之在己，一般的性別分工概念裡，認爲不宜讓相對體能較差、應擔負相夫育兒職責的女性來參與。因此，「女兵」此一角色在社會、文學裡的成立，前行研究者認爲是在晚清以來婦女解放運動上前進了一大步。[2] 再者，謝冰瑩所代表的民國女兵，不是歷史故事中津津樂道的梁紅玉式女將形象，而是軍隊正式編制一分子，且不以塑造「單一」「英雌」爲要，更凸顯「女性」「群體」也能在最陽剛的領域、最迫急的國族保衛戰中，於

---

1 如《從軍日記》在報紙上連載時，林語堂即已著手翻譯為英文；《一個女兵的自傳》於 1940 年開始有英譯本，題名為 *Girl Rebel*（女叛徒）。任教於廈門大學的汪德耀則將《從軍日記》翻譯為法文，目的是要讓法國人知道「中國還有不裹腳的新女性，勇敢的女戰士」，可以說女兵的存在也具備洗刷民族惡劣形象的功能，見徐小玉，〈《從軍日記》、汪德耀、羅曼羅蘭〉，《新文學史料》，期 4(1995)，頁 93。

2 如曾發表多篇謝冰瑩研究文章的李夫澤，就將謝冰瑩女兵書寫定位於「充滿女性解放的意識」、「一部女性的奮鬥史」等等。見李夫澤，〈論謝冰瑩的《女兵自傳》〉，《湖南社會科學》，期 1(2003)，頁 125-127。

前線貢獻力量。[3] 甚至在國府遷臺以後，她仍舊被塑造爲愛國新女性的符號。

然而，「女兵」現身，是否就意味著女性社會位置的提高？在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女」的生理身分幾乎爲「兵」的自我鍛造所壓倒，如脆弱性情、好修飾外表、過度感性、沉湎於愛情等等，均被劃歸爲「女」的元素，在成爲「兵」的前提下，宜去之而後快。「自由戀愛」與「女子從軍」同樣被視爲進步象徵，可是，在「女兵」的自覺裡，前者是後者的絆腳石，因爲愛情更趨向個人，戰爭更趨向集體，愛欲的身體和愛國的身體難以共存。軍裝雖然遮蔽了女性身體，兩性羞恥界線的差異，仍使得女性在軍旅中得直面許多難題；女性即使當了兵，仍被期待、被認定更適合從事宣撫工作，因爲「女」性特質更親切。「女兵」之「女」，究竟是阻撓還是助力？女子從軍固然使女性與民族主義話語深度結合、符合當時需要，然而，這種結合眞是如此順遂無疑嗎？民族主義話語是否掩蓋了其中的性別掙扎？[4]

女兵生活以及數度離家爭取婚戀自由的早年經歷，讓謝冰瑩與進步女性畫上等號。然而，1940 年代末她就已開始刪改著作中的左傾痕跡，[5] 來臺以後，服膺臺灣的政治空氣，

---

3 周海娟，〈從「巾幗英雄」到「職業婦女」：我國女性在軍隊中角色的歷史變遷〉，《東吳歷史學報》，期 16（2004 年 6 月），頁 160。論者提及，民國以前，女性從軍的歷史事件「多限於個人事功」，且並未建立「全面且長久性的女性從軍制度」。

4 范銘如，〈從強種到雜種──女性小說一世紀〉，《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217。

5 左傾經歷於 1948 年在上海晨光出版社版本的《女兵十年》就已刪去，來臺後修正發行的版本當然更不可能保留。

舊作在臺發行時，更是大幅刪減自由戀愛與左翼思想情節。[6] 中國大陸出版界重印其著作時，受她指責竄改，日後卻證實並非竄改，而是她力圖掩蓋早年的左傾經歷，[7] 加上她曾提案開除女作家郭良蕙的中國文藝協會會籍，相關研究中也出現了謝冰瑩中晚年是否從前進者變成保守者的討論。[8] 其思想變化、改動著作等方面，已存在不少精彩研究，故本文較不著力於此。

謝冰瑩一生波瀾起伏，其女兵經歷、思想與寫作的轉變與「自我修正」等等，學界已有相當扎實的研究成果。本文將在前人基礎上，集中討論謝冰瑩 1920-30 年代完成、出版的《從軍日記》、[9]《一個女兵的自傳》、[10]《新從軍日記》[11] 中的軍旅書寫。[12]《從軍日記》針對 1926 年她投考武漢中央

---

6 見林孟君，〈論謝冰瑩的性別主體與文學創作〉（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論文中〈刪除《女兵自傳》的左翼革命書寫〉一節對於謝冰瑩刪修情形做了詳細比對。另在張堂錡〈論謝冰瑩的左翼思想及其轉變〉一文中，以林孟君論文中表格為基礎進行刪修補充，也清楚顯示出謝冰瑩在幾個版本的女兵故事裡對於左傾痕跡的遮蓋，見《淡江中文學報》，期 32（2015 年 6 月），頁 300-304。

7 張堂錡，〈論謝冰瑩的左翼思想及其轉變〉，頁 293-308。

8 郭良蕙(1926-2013)以美貌與寫作題材大膽著稱。林孟君在〈論謝冰瑩的性別主體與文學創作〉中提出解釋，認為謝冰瑩與蘇雪林、穆中南、劉心皇等大動作修理郭良蕙，顯示出其選擇與官方戰鬥文藝立場一致，且與戰時在前線給予婦團的戒規「只有團體，沒有個人」類似。見林孟君，〈論謝冰瑩的性別主體與文學創作〉，頁 130-134。

9 《從軍日記》1928 年結集，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由於在臺灣資料取得不易，本文根據的是 1932 年上海光明書局再版。

10 《一個女兵的自傳》於 1936 年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11 《新從軍日記》於 1938 年由漢口天馬書店出版。

12 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工作告一段落後，謝冰瑩還寫作了《第五戰區巡禮》，最早在 1938 年由廣西日報社出版。由於內容偏屬訪問、報導性質，和本文所欲探討的三部作品集中於自身經歷的發抒不同，故不

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以下簡稱爲武漢分校女生隊）、接受正式現代軍事訓練的經驗，《一個女兵的自傳》涵括上述經驗，並加入她自身的成長與叛逆歷程，《新從軍日記》則是來自 1937 年她組織婦女戰地服務團上前線服務的經歷。本文預備將謝冰瑩的軍旅書寫放回所屬時空脈絡，考量北伐與抗戰時期她在前線服務的情況，並加入軍隊此一全控組織(total institution)如何通過一連串手段來進行角色塑成(role molding)，改造入伍新人，使之合乎組織要求的觀點，集中闡釋謝冰瑩筆下「女」如何試圖以「擬男化」手段去「女」成「兵」、最後卻自我認同爲「女兵」的過程，以及「女」與「兵」在戀愛與日常事務上顯示的矛盾，期望能爲謝冰瑩研究注入新意。

二、謝冰瑩的前線經歷與寫作

當兵並非個人獨立能夠完成的事務，必須加入組織，從屬、效忠於政府或國家，女兵也不例外。謝冰瑩自述女兵認同時，在修辭上將個人與國家並置，〈《女兵十年》再版序〉中就說：「《一個女兵的自傳》出版到今年恰恰十年了！十年來，國家經歷了一次空前，也許是絕後的災難，我也嚐盡了人間的艱難困苦。」[13] 一方面勾連寫作資歷、個人遭逢與

納入。另外，謝冰瑩於 1939 年參加大後方勤務部與基督教組織合作招募的服務團，目標是到各處傷兵招待所去工作，這是她第三次上前線服務，不過，留下的文字極少，亦不納入討論。

13 謝冰瑩，〈《女兵十年》再版序〉，《一四七畫報》，卷 5 期 10（1946 年 8 月 21 日），頁 11。

國家苦難，另一方面，卻也不無弦外之音：「我」的苦難與國家的苦難同時存在，前者不能被後者覆蓋。

寫作從軍經驗並因此成名，讓謝冰瑩遇到了這樣的質疑：1940 年代初，一篇稍帶花邊性質的報紙文章裡描繪，抗戰期間曾有軍官詢問謝冰瑩：「你是來找創作材料的吧？」謝答覆：「我是帶了女兵來替國家服務的。」[14] 不論此一事件眞假，此一問答之設置，直指個人與集體間的矛盾：投入前線，是滿足個人寫作需求，還是爲公共服務的神聖工作？謝的回答是後者。然而，從《從軍日記》到《一個女兵的自傳》，她添寫了許多高潮起伏的個人成長經歷，強化五四叛逆女性離家爭取自由的奮鬥，顯然在「國」與「軍」之外，仍有個「我」需要被看見、被彰顯。

謝冰瑩的前線經歷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作爲武漢分校女生隊一員參加北伐，[15] 第二階段是抗戰時自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服務。前者屬於正規軍，後者則比較近於民間自發組織，故以下亦分爲兩個部分闡述，期能扼要說明謝氏前線經驗之始末，與其相關題材的散文寫作在當時激起的反響。謝氏的總體創作歷程，前人研究中多有詳細考證與陳述，[16] 故本節主要鎖定的是：分疏兩次前線經驗的性

---

14 舜元，〈謝冰瑩與女兵們〉，《天文臺》，期 430，1941 年 1 月 16 日，第 4 版。

15 黃埔軍校女生隊的發起、訓練與活動的扼要敘述，可見顧秀蓮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婦女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8），頁 236-238。亦可稱為「中央政治軍事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而謝冰瑩是黃埔第六期錄取的 195 個女生之一，後因名額超收、反對複試、開除反對行動的代表、改名並更換籍貫再參加考試等曲折過程，最後還是入伍了。此一過程可見《一個女兵的自傳》裡有詳細敘述。

16 可參見周芬伶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4·謝冰瑩》（臺

質、聯繫到與這兩次經驗直接對應的《從軍日記》、《新從軍日記》，並考察當時對這兩部作品的評價。

（一）北伐時期

謝冰瑩從軍過程，可視爲 1920 年代亟欲從封建家庭出走的青年女性縮影。她本名謝鳴崗，出生於湖南新化縣，家境殷實；父母思想保守，曾替她纏足但不果，且自幼訂親，幾經爭取後方出外讀書。1926 年，父母逼她履踐婚約，愁悶之際，得知中央政治軍事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六期正在招收女兵，遂前去報名應試，一方面以此爲逃婚藉口，另一方面，也能滿足女性青年自我解放與貢獻國家的雙重願望。

武漢分校招收女兵並非突然之舉。1925 年，廣州黃埔軍校辦的刊物《中國軍人》上，就出現了建議應開放婦女從軍的投書；[17] 另外，廣西女子金慧淑多次要求報考軍校，甚至陳書於蔣介石等人，仍未能得到理想回應，也頗引起注目。[18] 有了這些「先聲」，武漢分校女生隊（1927 年 1 月成立，1927 年 7 月解散）的招募可視爲回應時代籲求。再者，從 1926 年 12 月在武漢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1927 年 1 月 1 日正式遷都辦公，到 1927 年 7

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該書包含評傳、研究資料彙編與選摘、年表等。

17 洪筠，〈軍人與婦女〉，《中國軍人》，期 3（1925 年 3 月 12 日），頁 7-10。

18 王美怡，〈中國 20 世紀初的現代女兵與黃埔軍校〉，舒揚主編，《黃埔軍校研究・第三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頁 276-277；邢照華，《黃埔軍校生活史 1924-1927》（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 267-272。

月中爲止，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雖然爲時甚短，卻強化了一連串的革命試驗，包括工農運動與婦女動員。因此，武漢分校招收女生隊一事，乃是婦女解放運動與政治情勢變化二者共同塑造，亦可視爲武漢政權及兩湖地區的左翼婦女解放運動脈絡裡的一部分。

訓練結束後，武漢分校女生隊隨戍守武昌的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的部隊，西征討伐楊森、夏斗寅的叛變勢力，[19] 行軍經過咸寧、嘉魚、蒲圻、新堤等地，到返校爲止，共 34 天（1927 年 5 月 18 日-6 月 20 日）。時間不長，卻讓女兵們見識到鄉鎮的革命進行現況與前線的震撼。當時任職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編輯的孫伏園(1894-1966)，鼓勵謝冰瑩多多生產來自前線現場的紀錄。於是，謝把軍旅感思寫在給孫的通信裡，孫遂將這些書信發表於副刊上，從 1927 年 5 月 24 日連載到 6 月 22 日，極受矚目，立即打響名聲，文學女兵形象從此和謝冰瑩常相左右。[20] 除了孫伏園，林語堂(1895-1976)也是謝冰瑩成名的重要推手，因爲賞識此一「實地描寫革命生活的文字」，[21] 將之翻譯爲英文，刊登於《中

---

19 四川的楊森勢力與湖北的夏斗寅勢力為何叛變、如何結合，可參見劉繼增、毛磊、袁繼成，《武漢國民政府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頁 372-374。

20 二戰結束後，上海消閒刊物刊出〈女兵謝冰瑩——作家群像之一〉一文，強調其「進步女性」事蹟，包含從軍與大膽戀愛。天行，〈女兵謝冰瑩瑩——作家群像之一〉，《禮拜六》，期 98（1947 年 10 月 25 日），頁 12。《中國時報》2000 年 1 月 8 日第 11 版報導標題為〈文學女兵謝冰瑩逝世舊金山〉，由此可見，謝冰瑩文學女兵形象歷久不衰。

21 林語堂，〈冰瑩從軍日記序〉，《從軍日記》（上海：光明書局，1932），頁 4。

央日報》英文版，繼而被翻譯爲其他語文。後來出版了英文單行本。

隔年，《從軍日記》集結出版，報刊上不時可以看到相關評論，多數持激賞態度。如讚美謝冰瑩能將革命生活記錄下來，「中國第一個開始新時代的生活與紀錄的女軍人喲」。[22] 一份 1930 年代初的文化刊物指出，由於題材特殊，《從軍日記》乃是「可以代表時代的實生活底作品」，翻譯到國外後甚至得到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讚賞，[23] 且被拿來與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西線無戰事》相較，論者認爲《西》書「站在非戰主義的立場來詛咒戰爭」，而謝作則「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鼓勵戰爭」，[24] 只要是爲著革命的戰爭，就是正當的。另外，在一篇讚揚《從軍日記》的書評中，作者提及，冰心已經過時，丁玲正是當前女作家魁首，然而，「也許冰瑩寫作的技術，還趕不上過去的冰心和現代的丁玲……（中略）正如我們吃膩了蜜嘴行甜食，須得吃一點有刺激的鹹辣子來換之口味。我們看厭了千篇一律的愛情的影片，我們需要看一點生動的全武行武俠的寫實影片，來換換眼界」，[25] 又說

22 李白英，〈借著春潮給「從軍日記」著者〉，《春潮》，卷 1 期 7（1929 年 6 月），頁 115。

23 亦可參考徐小玉，〈《從軍日記》、汪德耀、羅曼羅蘭〉，頁 97。謝冰瑩本人對此事相當得意，直至晚年仍對採訪者提起，見孟華玲，〈謝冰瑩訪問記〉，閻純德、李瑞騰編選，《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 202，訪問是 1991 年進行的。

24 林易，〈「從軍日記」底榮譽〉，《讀書月刊》，卷 2 期 3（1931 年 6 月），頁 25。

25 荔荔，〈讀了「從軍日記」後的閒話〉，《青海》，卷 2 期 1（1929 年 4 月），頁 45。引文中「換之口味」的「之」字疑為贅字，然該刊

謝冰瑩不吟風弄月，「是個實地上過戰場、經過砲火過來的女丘八」，[26] 指出她的寫作題材與風格在冰心的婉約、丁玲的大膽之外獨樹一幟，書寫軍旅經驗，既新鮮又具有臨場感。

持批評意見的，數量要少得多。例如，認爲《從軍日記》雖然呈現了「眞實」但是「技巧並不完整」，[27] 也有人取反戰態度，認爲「現在的革命軍是只在和兵士們的性命和人民的希望開著頑笑，則其謳頌，未必有何可觀」，[28] 或者同樣將之與雷馬克《西線無戰事》相較，指出《西》書更能顯出人性深沉的一面，「末了我總要告訴冰瑩女士——《從軍日記》的作者：傷死相狼藉的同志們是沒有衝上前線再去流頸血的遺志吧？」[29] 顯然認定《從軍日記》謳歌軍事和戰爭，太過天眞。

無論在文學上評價如何，北伐革命軍對「女兵」是持正面態度並拿來當作宣傳材料的。例如提出古代有木蘭從軍，「在那做出的事，倒比男子強——爲國家出了力，又替父親代了勞」，到了今日，「革命軍中也出了不少的木蘭，即所謂『女兵』」，並說「革命若是要分男女，那革命永遠不會成功的」。[30]「木蘭」是女子從軍論述中最常引用的古代資源，不過，木蘭假充男子，軍隊同袍不知道她是女性，現代

原文如此。

26 荔荔，〈讀了「從軍日記」後的閒話〉，頁 45-46。

27 毛一波，〈從「春潮」讀到「從軍日記」〉，《春潮》，卷 1 期 6（1929 年 5 月），頁 139。

28 劍予，〈「西線平靜無戰事」與「從軍日記」（下）〉，《開明》，期 35（1931 年 9 月），頁 7。

29 劍予，〈「西線平靜無戰事」與「從軍日記」（下）〉，頁 7。

30 〈女兵〉，《革命軍日報副刊》，期 92（1927 年 9 月 17 日），頁 89。《革命軍日報》由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政治訓練部編輯出版。

「女兵」卻是在已知爲女性的前提下接受軍事訓練，同時爲了強化婦女解放這一點，更會強調「女兵」的女性身分。另一篇文章則指出，除了木蘭，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武藝甚佳，每率領大腳婦女隊伍協助兄長與清兵作戰，「士兵同志們！你們見了我們革命軍中的女同志，便驚爲中國未有之奇觀，誰知中國的女兵正多呀！」[31] 把「女兵」和「奇觀」並陳，倒是點出了「女兵」從視覺連帶到性別分野上的衝擊性，這一點後文會再提到。

（二）抗戰時期

1937 年，爲響應抗戰，謝冰瑩赴長沙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第一團（1937 年 9 月-1937 年 11 月），跟隨第四軍吳奇偉將軍部隊，開赴嘉定前線。北伐時期她屬於正規軍人編制，組織湖南戰地服務團卻屬於自發性質，難以「抗戰女兵」視之，不過，她在這個時期的行動與寫作仍和軍隊密不可分。

當時受時潮影響，戰地服務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由作家組織的，除了謝冰瑩的這一團，名氣最大的應屬丁玲(1904-1986)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1937 年 8 月-1944 年 5 月）。當然，非作家領導的更多。[32] 同樣由作家領導，但是湖南與西北這兩個服務團性質差異很大。丁玲的服務團隸屬於共產黨，以共產黨創辦的抗戰軍政大學學生以及延安青年文藝工作者爲主，男女兼容，沿途以戲劇、歌詠等方式喚醒民眾抗

---

31 陶滌亞，〈我也來談談女兵〉，《革命軍日報副刊》，期 105（1927 年 9 月 30 日），頁 141。

32 見陳三井編、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 366。如三青團的婦女服務隊、漢口女青年會的戰時服務團、上海戰地婦女服務團等。

戰意識，也寫作戰地通訊寄到各地報刊發表；謝冰瑩領導的服務團則以學生、教師、護理人員爲主，主要從事救護、慰勞、宣傳等工作，[33] 物資則主要是勸募來的。[34] 這一趟前線服務的見聞感思，謝冰瑩寫成了《新從軍日記》，在名稱上即有意識地自認是接續了北伐時期的女性從軍的努力。根據當時的媒體報導，婦女組織團體上前線爲抗戰服務，其意義被認爲是「這大時代的洪爐，能夠把柔弱的閨秀鍛鍊成建築新長城的中間礎石」，[35] 從「柔弱」到「礎石」，即是剛強起來的過程，而「閨秀」是單獨閉鎖房內的，成爲「新長城」的礎石之一，則意味著融入群體。

這一次前線服務而誕生的《新從軍日記》，以和《從軍日記》類似的書名來喚起讀者的熟悉感，也再次強化「女兵」形象。出版後，雖然並未得到如當年《從軍日記》那樣的轟動，仍有評論家視之爲革命心靈的再發出，指出「一貫的簡潔明快的作風」和「每個短節幾乎都有幾句生動的對話」是她的寫作特色，且能將戰場上的實況做「無情的暴露」。[36]

文字作品之外，謝冰瑩個人形象頗受矚目，尤其女性著軍服，印象鮮明，也是注重視覺表現的各式畫報或雜誌攝影專頁喜歡的題材。抗戰時期她雖非正式編制的女兵，仍以軍

---

33 劉嘉谷，〈謝冰瑩研究札記〉，《中國文學研究》，期 1(1987)，頁 112。

34 謝冰瑩，〈到上海去〉，《新從軍日記》（漢口：天馬書店，1938），頁 92。文中提到赴上海是為了「向文化救亡團體徵求贈送救亡書報，向婦女慰勞會要求捐贈藥品，紗布，棉花，同時替本團募集棉被」。

35 方與嚴，〈戰時教育十日短訊——戰地婦女服務團三次出發〉，《戰時教育旬刊》，期 4（1937 年 10 月 25 日），頁 6。

36 堵述初，〈新從軍日記〉，《宇宙風乙刊》，期 2（1939 年 3 月 16 日），頁 88-89。

服面目示人。如曾有刊物登出「湖南婦戰團團員生活」攝影專頁，其中兩幀照片特別標明：「北伐時的女傑從軍日記作者謝冰瑩女士。率領三湘兒女二十餘人，組織婦女戰地服務團，參加淞滬前線戰地工作。在小河邊洗衣者即謝女士。」（圖一左）以及「在行軍時不忘寫作的婦戰團團長謝冰瑩女士。」（圖一右）[37] 且無論洗衣或寫作，均身著軍服。顯見得「女兵」是讀者好奇也樂見的題材，謝冰瑩更已經成爲「女兵」視覺形象的代言人。

圖一　湖南婦戰團團員生活

資料來源：《中華》，期 59（1937 年 11 月），頁 31。

介於北伐與抗戰時期之間，謝冰瑩在女兵經歷上添加了個人的成長、婚戀與寫作經驗，完成《一個女兵的自傳》；前線生活雖然只佔了內容一部分，仍以之爲書名，可見謝本

[37] 《中華》，期 59（1937 年 11 月）刊出四張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照片。另外，如《抗敵畫報》，期 10（1937 年 11 月）也刊登過多幀謝冰瑩照片，冠以「巾幗英雄」字樣，頁 18。

人自覺與「女兵」畫上等號。這三部作品除了彰顯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突破男性領域壁壘等時代意義外，畢竟是一種對於個人生命的文學性「再現」(representation)，其基礎固然是個人經歷，可是，敘述立場與呈現何種內容、或如何呈現，卻處處受到寫作當下或出版時地的文化政治左右，[38] 同時也因為她自身的主觀感受，與為求生動而自覺採取的書寫策略，並不能直接視為史料。但是，這些書寫中透露出的女性參與公共事務時的矛盾、大我與小我的協商以及軍人身心改造的過程等，均展現了複雜的性別意涵。

三、解放或規訓？──「女兵」的角色塑成

當謝冰瑩不願服從包辦婚姻、向父母申訴無效，軍校招考女生的消息正好給了她以「愛國」為理由、脫離封建家庭並暫時逃避婚姻的機會：

> 我相信，那時女同學去當兵的動機，十有八九是為了想脫離封建家庭的壓迫，和找尋自己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軍服，拿著槍桿，思想又不同了，那時誰不以全世界的十二萬五千萬（按：原文如此）的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擔子放在自己肩上呢？[39]

從軍讓女性從封建家庭壓迫中解放，而女性竟能參與過

[38] 柯惠鈴，〈軼事與敘事：左派婦女回憶錄中的革命展演與生活流動(1920s-1950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142-143。

[39] 謝冰瑩，〈當兵去！〉，《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頁 134。

往只容納男性的軍隊，也似乎得到了某種意義上的男女平等。而謝冰瑩自己也對於軍人殺敵報國的形象非常認同，「我出發的目的原來是要喊著殺！殺！殺！的口號和勇敢的戰士一同去衝鋒殺敵，嚐嚐槍林彈雨中生活的滋味」，但是，實際上從軍生活卻是在不斷移防中度過，「除了看見俘虜，幾乎連敵人的影子也沒見到過」。[40] 日後當《從軍日記》出版單行本，謝氏還再次強調，當年參軍，奔走在湘鄂道上時，最大願望就是「換上戎裝，練成鐵一般的身體，鋼一樣的精神，快快學好戰術，好與敵人拼命」。[41]

由上述可見，從軍以殺敵報國的奮猛精神和戎裝上陣的外在形象，在謝冰瑩的想像中是合而為一的。入伍後，軍服上身，手拿槍桿，新的裝束賦予參與革命的實感，使其思想也起了變化，正顯示出服儀、器物等如何作用於身心規訓。再者，離家從軍固然出發點是為了找到一己的出路，卻也是讓個人的解放匯入了時代洪流，從獨善擴大為兼善。軍隊訓練其實是一種嚴密的規訓過程，泯除個人，順從集體。從家庭逃出，固然是為了彰顯個人意志，往軍隊去，卻是進入另一個泯除個人意志的集體。謝冰瑩服膺當時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相聯繫的主流話語，並未自覺到解放與規訓之間的曖昧參差。

軍校、軍隊，其屬性均為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42] 機

40 謝冰瑩，〈說不盡的話留待下次再寫〉，《從軍日記》，頁 37。

41 謝冰瑩，〈寫在後面〉，《從軍日記》，頁 69。這篇後記寫成於 1928 年底。

42 詳細見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Y.: Anchor Books, 1961), Chapter 1,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Institution."

構全面控制成員的生活，與機構之外形成差異，並產生隔離效果；當謝冰瑩進入軍校受訓，通過再三重複且集體齊一的作息、單一權威的管控、預先計畫安排的生活行程等等策略，即是對機構成員實施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43] 她也提及這與過往自由的普通校園生活形成很大對比。[44] 但是，這種陽剛化的紀律生活，對謝冰瑩來說，正是女性解放與婦女報國的連接點：

> ……想到再過幾個鐘頭，我們就要拿槍桿操著「一二三四」了。「兵！」這一個多麼有力的字！真想不到數千年來，處在舊禮教壓迫之下的中國婦女也有來當兵的一天，我們要怎樣努力才能負擔起改造社會的責任，才能根本剷除封建勢力呢？[45]

「拿槍桿」、「操著『一二三四』」，特殊配件加上操演動作，日日重複下，必將重新規範身體。槍桿是沉重而堅硬的武器，而操練則注重集體劃一的秩序，流汗，曬黑，讓身體逐漸變得耐重、耐於重複的無聊，規整於群體之內。正式入伍後，新兵們看到「……同時有三個官長從裡面走了出來，有一個是女人，全副武裝，打著一副黃呢的綁腿，完全與男的一樣……」，[46] 武裝向來是男子與軍隊的專利，而謝冰瑩不無欣羨意味的文字透露出，她認爲女性全副武裝能形

---

43 指成員被放入價值截然不同的新環境中，重新社會化以適應新環境的過程。

44 「奇怪，過慣了浪漫的，自由的學生生活的我們，突然來這裡過這種機械的，艱苦的，唯命是從的軍隊生活，誰也不感覺到苦痛」，見謝冰瑩，〈入伍〉，《一個女兵的自傳》，頁 164。

45 謝冰瑩，〈入伍〉，頁 162。

46 謝冰瑩，〈入伍〉，頁 156。

塑出擬同男子的氣概，通過「擬男化」，「女」也能鍛鍊成「兵」。

這些女兵新鮮人很快拿到了自己的軍服：「按著點名冊每人發了一身灰布棉衣，一頂帽子，一雙橡皮底鞋，一雙草鞋，兩雙黑布襪子，一雙灰布裹腿布，還有一根一寸多寬的束腰皮帶。」[47] 接著，她們收到命令，脫去小姐衣服，洗淨胭脂，頭髮一律剪短，最好像是男兵一樣剃光。「那位男官長（後來打聽才知道是連長）告訴我們怎樣打綁腿，怎樣束皮帶，怎樣戴帽子，怎樣敬禮」，同時，「你們首先要認清楚，到這裡不是像在文學堂似的過著浪漫的舒服的小姐生活，你們都是兵，今天開始入伍，軍人的天職是服從紀律，服從長官，整齊嚴肅，吃苦耐勞⋯⋯」。[48] 要把某個角色扮演好，就必須遵循一組應對的、被規範好的行爲模式，而這組行爲模式具有約束與維護力，有助於讓進入此一角色者更緊密地嵌合在機構之中。[49] 進一步看，長官的講話訓勉、軍隊的語言、即將來臨的操練、槍桿與服裝等等，都可說是通過典禮(rite)、語言(language)、姿勢(gesture)、器物(artifacts)等技術，[50] 在全控機構內對機構新人實施角色模塑、促進同化(assimilation)，再社會化方爲可能。

當女兵們換上了兵服，預備好進入新角色，感想卻是：

47　謝冰瑩，〈入伍〉，頁 157。

48　謝冰瑩，〈入伍〉，頁 158。

49　錢淑芬，〈全控機制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化：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初官養成教育的模塑制度為例〉，《復興崗學報》，期 103（2013 年 12 月），頁 152。文中詳細解釋「制度化」的意義，以及「角色」與「規範」在「制度化」過程中起的作用。

50　見錢淑芬，〈國軍軍事院校「軍事社會化」之研究〉，《復興崗學報》，期 49（1993 年 6 月），頁 333-364。

「啊呀！衣服太大，我穿著好像在唱木頭戲呢！」[51] 玩笑之語，卻恰恰點出陽剛氣質(masculinity)本身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當兵」與「做戲」，看上去不相干，實則這些對軍事種種倍感新鮮的女子們，穿上軍／戲服，演什麼要像什麼，要融入那身服裝所欲模造的、符合特定角色的身體文化。Judith Butler指出，性別範式的鞏固，乃是在社會文化機制底下，通過行爲模式、符號系統等方面一整套風格化的重複演練(a stylized repetition of acts)而成。[52] 因此，群體共有且負載身分意義的軍服、短髮，再加上紀律化生活，一整套操練替這些女性置換性別形象，改寫身體意涵，還能促進認同，「二十分鐘後我們都變成了粗魯的，精神奕奕的丘八了」[53]——「粗魯的」，宜於男子而不宜於女子的氣質，是「女」欲將自己改寫爲「丘八」時，必須藉由穿戴軍服而同時穿戴上身的男子氣概；而且，不只是「我」，還是「我們」，軍隊最強調的集體精神。而這種「服從」的集體精神，看似與謝冰瑩最初想逃脫封建家庭時的「不服從」相背，就當時的時代氛圍來說卻不是太讓人意外的選擇：不服從封建家庭的舊秩序，服從在軍隊裡貫徹實踐的國族新秩序。一般來說，「服從」呈現出來的屈從形象，會被視之爲陰柔特質，可是放到軍隊裡，「服從」卻表示深刻認知並體現正確的權力秩序，與「權威」一同構成了軍隊的陽剛性。

這一整套操演，也像性別反串演出一樣揭示了性(sex)與

51 謝冰瑩，〈入伍〉，頁 159。

52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140.

53 謝冰瑩，〈入伍〉，頁 159。

性別(gender)的對應乃是文化建構的結果，而非本質如此，[54] 且以此爲突破點，試圖打開不同性別樣態的認識空間。謝冰瑩於《從軍日記》早就描繪過，當她獨自先於隊伍抵達嘉魚，竟被滿街人所包圍：「啊呀！女兵來了！女兵來了！這個騎馬的女兵恐怕是什麼官長罷？一片喊聲，連關在九層樓上的閨女也通通出來了。」[55] 戎裝女子騎馬的奇觀性，驚動了「九層樓上的閨女」，此段富於文學誇飾意味的描寫，強調「女兵」此一新時代新身分，衝擊了仍守在深閨、將自身「束之高閣」的女性們。跟隨著女兵的當地住民約有二、三百人，「我已經做了西洋鏡裡的『古董玩器』，不，新時代的怪人物」[56]——她先想到自己像是「古董玩器」，緊接著否認了，復以「新」與「怪」來自我調侃與標籤——畢竟擺設般的存在、玩物似的命運，正是進步女青年極力要擺脫的，而因爲打破傳統造成的「新」與「怪」，雖然使其變成受凝視與議論的對象，謝冰瑩卻似乎樂在其中。「女兵」的樣貌——「大腳，沒頭髮，穿兵衣的女人」，成爲奇觀的同時，也反身覺察了被奇觀化的自己，藉此更肯認了革命女性的先鋒性，「爲革命而死，爲百姓的利益而死，這是多麼痛快的事呀」。[57]

一方面，謝冰瑩以生動活潑筆調再現女兵奇觀化、新女性不被持舊價值者理解的狀況，證明了「女兵」們是如何的「新」，另一方面，亦暗示將之視爲「怪」的鄉人們顯然尚未覺醒、跟不上時代，需要接受新思潮教育。奇觀與先鋒，

---

[54]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pp. 137-138.

[55] 謝冰瑩，〈三從軍日記三節〉，《從軍日記》，頁 28。

[56] 謝冰瑩，〈三從軍日記三節〉，頁 28-29。

[57] 謝冰瑩，〈三從軍日記三節〉，頁 29。

一體兩面，都是時代「異」形。五四以來，婦女運動主要活動區域在城市，尤其是擁有外國通商口岸的城市，對於新觀念接受得更快。城市以外的鄉鎮，女性行爲舉止主要依循的仍是傳統範式，因此，謝冰瑩的兵裝及「擬男化」形象容易被視爲怪胎，是一種越界，故內陸百姓才會生出疑惑：「你的腳這麼大，豈不要和你的『老板』穿錯鞋子嗎？」[58] 暗示大腳女性牴觸了普通生活遵循的性別常態、混淆了男女性應該呈顯的形象。軍隊裡男女兵雜處的情況，也容易使鄉人聯想到不正常的男女關係。[59]

後來，女兵們因爲任務暫停，暫時被遣散，[60] 於是「花花綠綠的衣裳，代替了威威武武的軍裝」。[61] 重拾女子衣著，也意味著卸除「兵」的身分。謝冰瑩和女兵同袍們的頭髮都剪得很短，「我們曬黑了的皮膚，和因爲握槍柄弄厚了皮的右手掌，也是一個給人認識我們的標記」，[62] 軍旅生活在身體外觀留下印記，且「誰也不願意脫下那套灰布軍裝，特別是那根被我們弄得很光滑很柔軟了的皮帶，眞不願把牠解下來。記得最初繫牠的時候，大家都感到麻煩⋯⋯（中略）後來慢慢地習慣了，除了睡覺，簡直一刻都離不了牠，我常把牠和槍當作我的愛人一般看待」，[63] 當戀愛與愛國衝突，選

[58] 謝冰瑩，〈三從軍日記三節〉，頁 31。

[59] 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190.

[60] 指 1927 年 6 月 20 日徐州會議後，解散武漢分校，男女學生獲得軍校畢業證書與遣散費，女兵們遂被迫脫下軍服，解除軍人身分。

[61] 謝冰瑩，〈解散的前夜〉，《一個女兵的自傳》，頁 216。

[62] 謝冰瑩，〈歸來〉，《一個女兵的自傳》，頁 219。

[63] 謝冰瑩，〈歸來〉，頁 220。

擇了愛國，並不等於不需要戀愛，而是轉換愛的對象：皮帶與槍桿是軍人的符號，而從軍正是因爲愛國。穿制服意味著剝奪個人性，當穿便服的自由又回到這些「女兵」手上，竟使她們「跑到百貨店，每人買了一頂草織的洋帽戴著，以遮蔽這個見不得人的頭」[64]——脫去「兵」衣，回復「女」子生活，亦即回到社會承認的正確性別形象，只好先行遮掩兵式短髮這一「擬男化」生活的痕跡。

女兵們即將解甲時，連長訓勉的一番話亦耐人尋味：

> 只要你們的信仰始終不變，只要你們時時刻刻都想到為革命而犧牲，那麼，在目前如果生活沒有辦法時，就是去當軍閥的姨太太也未嘗不可以，只是你們千萬不要沉醉在物質的享樂中，而忘了自己的使命。你們總要有一天刺死那萬惡的軍閥，才不愧是一個受過革命洗禮，受過軍訓政訓來的戰士，方不愧是一個有志氣，有思想的勇敢底女性！[65]

連長的談話或許說得太極端了些，然而，這類言論表現出在國族論述底下女性主體的虛化。脫下軍服，重新「現身」的女體，看似脫離了全控機構、走出「兵」的角色設定，其實，還存在著另一種「獻身」的管道，讓女子們能繼續扮演救國角色；男子從軍，才能爲國家捐軀，女子則無論在軍內或軍外，掩蓋女體或彰顯女體，都可以「以身許國」，成爲政治工具。不過，這段引文在臺灣東大版《女兵自傳》(1980)裡刪掉了，顯然日後謝冰瑩也意識到這種要求女性遠離戰場也可以另類「獻身」的言論並不恰當。

---

64 謝冰瑩，〈歸來〉，頁 221。

65 謝冰瑩，〈解散的前夜〉，頁 215。

再者，如前所述，謝冰瑩多次在著作中提到，軍隊長官認爲女性適合宣撫、護理工作，事實上，這種性別勞動配置是一種文化構成，護理工作女性化在中國是現代化的產物。[66] 無論如何，如同呂芳上指出的，「暴力下的戰爭，女生從事最多的是政工、後勤、救護、調查和文宣，而不是衝鋒陷陣的軍事行動」，[67] 謝冰瑩雖然抱持著「救一同志，即殺一敵人」的心情，將救護工作當成「間接殺敵」，[68] 仍難掩遺憾。女兵在體力、健康上不如男兵，但是，女性身分較親和，威脅感低，從事照護與宣撫更爲事半功倍，亦有研究者認爲這同時是女性從軍的性別弱勢與優勢。[69] 而根據研究指出，1930 年代中葉以後，闡述非常時期女子責任的報刊文章裡，已可普遍看到將「男性上戰場殺敵」與「女性擔任救護服務」的分工編入性別秩序的言論，[70] 此一觀念有助於全面抗戰後的女子動員，[71] 在謝冰瑩《新從軍日記》也能看到相同觀念的宣揚。

北伐時期，女界領袖呼籲「中國女子數千年來受環境之

66 周春燕，〈婦女與抗戰時期的戰地救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4（2014 年 12 月），頁 133-220。

67 呂芳上，〈「好女要當兵」：中央政治軍事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創設(1927)〉，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八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333。

68 謝冰瑩，〈一從軍日記〉，《從軍日記》，頁 3。文章裡作者表示繼續必須「暫時藏起我的熱情」來從事救護工作，這份熱情即是「赴流血犧牲的戰場去」。

69 林孟君，〈論謝冰瑩的性別主體與文學創作〉，第三章第一節之二〈接受軍中女性的性別弱勢〉、第一節之三〈挖掘軍中女性的性別優勢〉，頁 63-70。

70 周春燕，〈婦女與抗戰時期的戰地救護〉，頁 169。

71 周春燕，〈婦女與抗戰時期的戰地救護〉，頁 174-175。

壓迫，今日欲圖解放，唯有聯合女界同胞，齊上革命戰線」，那麼，如何上戰線呢？「女子雖不能荷槍作戰，要當極力擔任後方工作，以盡國民一分子之責。」[72] 1932 年組成的「華北婦女抗日救護隊」，其隊長明確表示，女性雖然不能操戈應戰，「後方救護各事宜，是我們女同胞應急之要務」。[73] 因此，武漢分校女生隊雖然也集中在軍校內受操練，但是主要爲的是培養軍隊內的政治工作人員。在北伐隊伍中，除了救護、宣傳工作，還深入農村，宣傳剪髮、放足等等。[74] 如謝冰瑩《從軍日記》裡就描寫過湖南婦女協會的活動，剪髮、上街呼口號的情形，她調到政治部之後也參與相關工作。[75] 在到了抗戰時期，謝冰瑩帶領的服務團，由於成員多半爲護士、教師、學生，更「理所當然」地擔負起救護與宣撫工作。《新從軍日記》中記錄了一位政訓處處長的話，指女性更適合做戰區民眾的組織工作，原因是：第一，百姓較不害怕女性，尤其女性工作人員與地方上婦女接觸，溝通才更有效；

72 郭德潔，〈在湖南女界歡迎「北伐女子宣傳隊」大會上的講話〉，收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655。郭為李宗仁夫人，當李宗仁部隊被編入北伐隊伍，她也組織了北伐宣傳隊，並親自擔任隊長一職。

73 劉寧元，〈抗日浪潮中的北平婦女抗日組織〉，《北京黨史》，期 5 (2005)，頁 11-13。

74 見顧秀蓮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婦女運動史上卷》，頁 236-238。另外，進步女性深入農村宣傳剪髮、放足，在 1920 年代，也是遍地開花的在地左翼婦女組織工作項目之一，甚至因為履行相關工作時過分激進，使得某些婦女在失去長髮後感覺到羞辱而自殺，見 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pp. 191-193.

75 謝冰瑩，〈一個可喜又好笑的故事〉，《從軍日記》，頁 11-12、18-20。

第二，女人性情溫和、耐煩，更利於向士兵與民眾進行宣傳，以防堵漢奸居中破壞。[76] 特別記下這番話語，且並未反對，只說談好了婦戰團的工作，可見相較於北伐時期，謝冰瑩此時已較能接受女性前線服務時性別化的工作想像與分配。

救護或宣撫工作的本質，是照顧、安撫、聯繫情感與社區關係，等於在公領域延續了女性在私領域的角色，可視爲家務勞動的公共化。[77] 謝冰瑩抱持著從軍殺敵的陽剛想像，以及對軍人身分的強烈認同，通過種種身體、紀律、思想的校正，想將「女」改寫爲「兵」；然而，從北伐到抗戰兩次前線服務，最後仍不得不俯允適應「女兵」身分，以及那背後依舊鞏固的性別分工。

四、戀愛與日常：「女」與「兵」的衝突

「女兵」在公領域裡仍必須擔負「女」的職責，那麼，在軍隊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女兵」又如何處理自身在私領域的事務？這當中是否涉及了「女」與「兵」的齟齬？

晚清知識分子提倡小說，認定小說具有「公性情」，其內容「一曰英雄，一曰男女」，既投合讀者愛好，也切合時代需求，因爲「非有英雄之性，不能爭存；非有男女之性，

[76] 謝冰瑩，〈太寂寞了，到火線去〉，《新從軍日記》，頁 125-126。另外，謝冰瑩主講、徐德筆記〈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在重慶省立女子師範講演〉一文，謝本人在 1981 年仍將之加入新版《抗戰日記》（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中，內容則是詳細說明女性適合擔任救護與宣傳工作，頁 446-451。

[77] 周海娟，〈從「巾幗英雄」到「職業婦女」：我國女性在軍隊中角色的歷史變遷〉，頁 164-165。

不能傳種」，[78] 而「爭存」與「傳種」，正是改革人士認定民族救亡事業中的著力之處。然而，「男女」究竟是「英雄」的輔佐還是阻礙？革命加戀愛，能增加革命成功機率嗎？或者要減去戀愛，革命才能專心致志？「英雄」和「男女」、「革命」和「戀愛」的加法與減法，從文學到現實，都是淑世大業裡不可逃避的數學課。如晚清小說《女媧石》(1904)說：「人生有了個生殖器，便是膠膠黏黏，處處都現出了個情字，容易把個愛國身體墮落情窟，冷卻爲國的念頭。所以我黨中人，務要絕情遏欲，不近濁穢雄物，這便名叫滅下賊。」[79]「膠膠黏黏」的情欲牽絆，與理應爽朗風發的愛國革命事業衝突，「墮落」更意味著陷入情／欲網是「下降」，從「愛國」的高層次掉往低層次，足可喪志，不得不防。

那麼，倘若已在革命途中，卻又陷入情欲泥淖，又該如何？丁玲正是一個例子。1930 年代，在知曉丈夫馮達已然背叛共黨的情況下，丁玲仍然與其同居懷孕生女；她曾如此申明：「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到底也還是一個人……。」[80] 並同時痛陳自己的軟弱。情欲與政治都同樣要求「獻身」，當二者發生矛盾，不完全忠誠於黨的身體，等於喪失了政治的貞節。

而在謝冰瑩的自我書寫裡，她屢屢自許做個革命者，卻又處處自覺受到女性情思、女性身體的牽制。例如她自述當

---

78 嚴復，〈本館附印說部緣起〉，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36。

79 海天獨嘯子，《女媧石》，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80 許楊清、宗誠編，《丁玲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 142。

兵契機，起因於二哥見她沉迷於古典言情著作，當面訓斥：「時代的血鐘響了，你還在夢裡睡著打鼾。這些才子佳人，千篇一律的糜爛故事，早就應該拋棄不看的；你是個覺悟了的女性，又極喜歡新文學的，爲什麼不讀革命的作品呢？」[81]「覺悟」、「新文學」與「革命」在二哥的話裡被連繫起來，對立面正是彰顯「沒有用」、「夢裡睡著」（顯示尚未醒覺）的「才子佳人」故事，在此二分框架下，想當「有用的女人」，就得拋棄戀愛幻想，往「革命」靠攏。

進了軍校，所唱「奮鬪歌」歌詞有「推翻封建制，打破戀愛夢／完成社會革命，偉大的女性」等字樣；謝冰瑩說：唱到「打破戀愛夢」一句，「總是把嗓子特別提高，好像故意要喚醒自己或者警告他人在革命時期中不應該戀愛似的」。[82] 即使擋不住愛情的發生，青年戰士也應「把狹義的愛的觀念取消了，代替著的是全社會被壓迫著的勞苦大眾的愛，同志的愛」，因爲戀愛不過是「有閑階級的小姐少爺們玩的把戲而已」。[83] 不過，雖然一再於自傳書寫中強調救國不應戀愛，實際上，生命遭遇往往與理念衝突。謝冰瑩與她的戀人符號（符業奇），均爲武漢分校學生改編的中央獨立師成員，一個在宣傳隊，一個被編入特務連，倆人時常在報刊上發表文學作品，因此熟絡起來，種下戀愛種子，後來結婚生女，又因種種現實磨難而分離。[84]

---

81 謝冰瑩，〈當兵去！〉，頁 131-132。

82 謝冰瑩，〈「打破戀愛夢」〉，《一個女兵的自傳》，頁 165。

83 謝冰瑩，〈「打破戀愛夢」〉，頁 166。

84 謝冰瑩，〈「打破戀愛夢」〉，頁 167。謝、符交往經過，可見符號，〈謝冰瑩和我的一段婚姻〉，收入閻純德、李瑞騰編選，《女兵謝冰瑩》，頁 16-17。

抗戰時，當謝冰瑩再度上前線服務，何香凝(1878-1972)也特別叮囑她與胡蘭畦(1901-1994)，「千萬不要讓團員們談戀愛，那是會影響到整個婦女的名譽和工作的」，並指出北伐時婦女曾一度與男人一樣負擔革命工作，卻因爲耽於戀愛，「後來社會一般人，竟因此藉口來破壞婦女，阻止她們參加任何政治活動」。[85] 謝冰瑩帶領湖南戰地婦女服務團時，即一再強調不談戀愛，以免妨礙救國，甚至與團員定下戒律共守：

> 第一、如果發現有誰談戀愛，經過兩人以上負責證明者（並且要舉出事實），由團長或副團長召集個別談話，用誠懇的態度勸告她。
>
> 第二、假如她仍然繼續戀愛，就給予多次的嚴厲警告。
>
> 第三、經過幾次的警告都不成，那麼就在會議席上，宣佈她在抗戰期中談戀愛的「罪狀」，徵求全體同意，採取最後手段，開除她！[86]

在《新從軍日記》中未曾看到此一戒律實施的情況，不知道是否眞能有效抑止戀愛，又是否眞有團員打過同袍的報告。然而，這樣的戒律，等於以公共監視之眼干預私人情感，視戀愛爲犯戒，因爲身心向情欲輸誠，未能徹底忠誠於國家。與前述何香凝的諄諄叮嚀合看，乃藉由團體內的相互監看，以及強調團體利益，激勵她們遵守規定、不被同儕看輕，以免變成阻礙女界參與公共事務的罪人。[87] 且不僅不鼓勵戀

85 謝冰瑩，〈「千萬不要談戀愛」〉，《新從軍日記》，頁 97。

86 謝冰瑩，〈約法三章〉，《新從軍日記》，頁 104-105。

87 錢淑芬，〈「穿制服的人」與制度化作用：軍人角色模塑的理論性探討〉，《復興崗學報》，期 99（2010 年 9 月），頁 63。文中討論的是男性官兵表現英勇，遵守軍中規範，是為了不被同袍看輕，故可利

愛，連與軍隊駐紮地居民（包括孩童）聯繫感情，也不可以太過濃厚，「因爲濃厚一定要妨礙工作的」。[88] 也就是說，感情聯繫若有助於軍隊事務，仍是被允許的，但必須自我克制，因爲情感聯繫只是工作手段，不能沉溺。

在北伐革命與抗日戰爭大旗下，公領域覆蓋了私領域，耽溺於私領域裡的小情小愛，容易消磨志氣，而未能全心奉獻，完成大我。這不僅是單一女性的個人問題，牽一髮動全身，還可能影響到女性此一集體的社會聲望，重挫婦女運動的成績。一方面認定女性威脅感較低，適合投入情感的宣撫工作，[89] 另一方面又要求克制情感牽連，聽起來似乎相當矛盾，然而，究其根本，乃是在女兵或女性前線服務上，將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推到極致，盡力讓這些女性在戰爭與軍事上的效力極大化。謝冰瑩汲汲於報國事業，亦有意識地將這份理性內化爲準則，對待自己的私生活也是如此：1937 年，謝冰瑩組織服務團上前線，她當時的伴侶黃維特正要去南昌，勸她一起先過去把病養好再上戰場去，謝的回覆是：「把愛情武裝起來，以民族國家的前途爲重。」[90]

《從軍日記》與《新從軍日記》自覺與戀愛劃清界線，那麼在《一個女兵的自傳》裡呢？這部作品並非誕生於前線工作時刻，且添加了更多與戰爭、國家無關的個人成長與情

用這種心理，加以啟迪、激發，使其自動自發表現出勇敢軍人應當有的樣態。

88 謝冰瑩，〈三從軍日記三節〉，頁 18。

89 謝冰瑩書中多次提及此一觀點。例如一位「劉處長」要求婦戰團團員多多協助宣傳工作，因為「老百姓看見你們就不害怕，就不會逃掉」。謝冰瑩，〈又在戰場上見面了〉，《新從軍日記》，頁 71。

90 黃維特，〈寫在前面〉，《新從軍日記》，頁 4。

感經驗。柯惠鈴討論左派婦女的回憶錄寫作時指出，與政治無關、進不了歷史政治敘事中的個人生命細節與抒情時刻，可視爲「軼事」，是這些部分突出了寫作者的個體性。[91]《一個女兵的自傳》出版於 1936 年，政治束縛並不嚴厲，她的政治意識型態雖然左傾，與左翼作家群體的關係並不緊密；[92] 全書個人色彩強烈，對生活與情感的變動著墨甚多，[93] 談及從軍經驗，和《從軍日記》有所重疊，強調公領域大於私領域，大我高於小我，反而在關於童年時代、初戀、四次逃家、解除包辦婚姻、成年後頗爲複雜的多角戀愛與婚姻狀況的敘寫上，更能見到她性情中熱烈奔放、容易動情的一面，也符合五四以來進步青年爭取婚戀自由的浪潮。不過，涉入個人婚戀經歷裡的人物，在書中多以單名或代稱帶過，有些甚至完全不提起，[94] 眞正得到大篇幅書寫的，主要是和符號的一段情感。來臺以後，重新修訂出版的《女兵自傳》裡，不僅刪去早年左傾經歷，也刪去了學生時代受同性追求的往事、軍

91 柯惠鈴，〈軼事與敘事：左派婦女回憶錄中的革命展演與生活流動(1920s-1950s)〉，頁 143-151。

92 謝冰瑩與左翼作家聯盟的關係，可見劉嘉谷，〈謝冰瑩研究札記〉，頁 108-110。

93 柯惠鈴，〈軼事與敘事：左派婦女回憶錄中的革命展演與生活流動(1920s-1950s)〉，注釋第 13 提到「左派女性在回憶錄中極少對個人情感變遷做出更多解釋」，與其他非左派女性回憶錄多著墨於個人情感變動，形成對比。見頁 147。

94 《一個女兵的自傳》主要提到的包括自小訂親的蕭明、軍校裡認識的符號（書裡稱「奇」）、單方面追求謝的徐名鴻（書裡稱「鴻」）、曾維繫短暫婚姻的顧鳳城（書裡稱「紉」，1931 年相戀，1932 年 1 月於上海註冊結婚、年底分離），在廈門期間重逢相戀的舊識黃維特（1933 年同居，《新從軍日記》收有他的序，1939 年雙方失去聯繫）則完全沒有提起。謝冰瑩與黃維特事，見欽鴻，〈謝冰瑩一九三八年抗戰日記片斷〉，《新文學史料》，期 4(2010)，頁 169-180。

校同學的大膽浪漫行動等，因爲「對於女孩子們沒有一點好處」、只是「遊戲文章」，[95] 倒是早年的叛逆與情感歷程，都保留了。

除了戀愛與感性，「女性氣質」的展露也需要管理。謝冰瑩在行軍駐紮途中，也觀察當地婦女運動與婦女協會工作。受到共產黨鼓動，兩湖的婦女組織十分蓬勃，比如她提到湖南的城市婦女多半剪了髮，「不剪的就由婦女協會派人等在路途中用強迫的手段實行『頭髮革命』」，同時，還「禁止城市中來到鄉間宣傳的女學生穿裙」，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爲她們應從奴隸位置覺醒，要「換過來做人了」。[96] 換言之，有尊嚴的「人」的形象是以陽剛男性爲楷模，做「人」的前提是不能做「女人」，因爲「女人」容易被當作玩物，去除了「女」性氣質，才能自立爲「人」。因此，對於外貌與服飾的管理，爲的是讓女性脫離被當作玩物的命運；左翼觀點認爲，婦女往往被男子視爲私有財產，是私有制底下性別與階級的雙重受壓迫者，婦女若想脫離附屬地位，就必須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這個要求也與女性從軍相合。

而當進步思想需要往非城市、非知識圈拓展時，說法也必須「因地制宜」。如《從軍日記》紀錄一位連長勸導婦女剪髮，理由竟是「可以免得你的老板牽著你的頭髮打」，[97] 其

---

95 謝冰瑩，《女兵自傳》（臺北：力行，1956），頁 161。與本文所依據的《一個女兵的自傳》相較，力行版刪去了寫失戀發瘋者的〈「剎那的印象」〉、談自己受同性愛慕的〈同性愛的糾紛〉、寫長沙學校裡教師間戀愛糾紛的〈情書貼在布告處〉、描寫軍校同學浪漫行徑的〈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

96 謝冰瑩，〈一個可喜又好笑的故事〉，頁 11-12。

97 謝冰瑩，〈三從軍日記三節〉，頁 32。老板意指丈夫。

實，家庭暴力又豈是長髮短髮可以改變的呢？從另一方面看，女兵們在外觀上盡量降低「女」的聯想，穿著灰撲撲的軍服、理平了髮、和男子一樣背槍受訓，卻仍得再三強調不應當戀愛，可見「擬男化」裝束並不能隔絕戀愛，眞正作用更在於協助塑成女性進入軍隊後的新角色。

與戀愛、外貌一樣困擾著女兵們的，還有極爲平凡的日常需求。北伐期間，女兵們在長沙集合報到，謝冰瑩和一大群從軍男女青年一起出發，半途卻極想如廁，在火車暫停時和一位女伴跳下車往鄉村裡跑去：「這簡直是一個難言的恥辱，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雖然兩個人都是初次出門，沒有坐過火車，但爲什麼她們都不知道呢？我們有勇氣去當兵，卻連廁所在什麼地方這句話也說不出口，眞是天下的大傻瓜。唉！爲什麼懦弱低能到這個地步呢？」[98] 等她們好不容易借到廁所，再回到車站時，火車早就開走了。無奈之下，只好向村人借宿，反倒引來許多人圍觀，她們怕那些男男女女是「人販子」，而村人也當她們可能是不正經的女人，否則怎會獨自在外頭踟躕？這個事件正顯示出當時女性行旅的困難。十年後，謝冰瑩又再感嘆了一次「女人出門第一件事感到困難的是廁所問題」。[99] 當女性努力讓自己能「爲國所用」，軍隊卻沒有考慮到女性可能面臨的生理窘境，可能是過去正規軍隊中並無女性，故未曾意識到「男女有別」；然而，女性從軍拼命想展示的，正是泯滅差別，著重於「男女同一」的愛國勇氣與殺敵渴望，在最爲基礎的如廁一事上，立即打破「同一」幻象。

---

[98] 謝冰瑩，〈鄉飽姥追火車〉，《一個女兵的自傳》，頁 136。

[99] 謝冰瑩，〈舊地重臨〉，《新從軍日記》，頁 20。

除了如廁，洗澡有時候也會成爲困擾。例如駐紮在新堤時，當地澡堂只有男子可去，女兵們紛紛抱不平，男兵們的回答是：「爲什麼不可以去？但是你們有這樣大的膽量嗎？」[100] 謝冰瑩認爲，這確實是女兵們不夠勇敢，因爲舊社會尚未徹底消滅，「誰敢去開男女浴堂的先例呢？」[101] 甚至怕被人與「共產公妻」的謠言聯想在一起。光憑謝氏文字，看不出男兵們的回答是調侃、邀請還是故作刺激語，是眞以爲共浴就是平等、鼓勵拋開男女禮教之防？或者是藉著解放之名作色欲聯想？

如廁、洗澡牽涉到身體與空間的性別認知，謝冰瑩筆下還時常提到另一處男女之別：體力與健康。例如男性長官勸告婦戰團應該到後方去，因爲「身體不如士兵……你們不能老跟著我們一起拖」，[102] 致使謝本人也感嘆「誰教我們是女人！老實說，我們的身體的確不如男人」，[103] 而當有男性自願擔任婦戰團勤務兵，她也不得不承認對方協助了許多女性來做較爲吃力的勞役。[104] 而這也是若干陽剛職場先入爲主地認定女性較難勝任的主因。[105] 從種種身體日常考量，原本就是男性場域的軍隊若要接納女兵，就得另外考慮女性需求，[106]「每個機關都覺得女人是個累贅，和軍隊一起

100　謝冰瑩，〈六從峯口到新堤〉，《從軍日記》，頁 45。

101　謝冰瑩，〈六從峯口到新堤〉，頁 45。

102　謝冰瑩，〈「刮刮叫」〉，《新從軍日記》，頁 261。

103　謝冰瑩，〈「刮刮叫」〉，頁 261。

104　謝冰瑩，〈抗戰日記新序〉，《抗戰日記》（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頁 3。

105　彭渰雯等著，〈女性在陽剛職場內的樣板處境：以海巡與消防單位為例〉，《東吳政治學報》，卷 27 期 4（2009 年 12 月），頁 22-29。

106　彭渰雯等著，〈女性在陽剛職場內的樣板處境：以海巡與消防單位為

走怪麻煩的，因此他們都希望我們早點回到後方」。[107] 換言之，婦女們不甘待在後方、願隨軍擔任工作，博得進步美名，也能讓婦女深度參與戰爭，陽剛取向的工作場域卻未必認可這份助力。進一步看，婦女固然覺醒了，體制固然鬆動了，未必就等於眞正開闢出可以讓婦女放心工作的空間，反因爲在有限資源下還要額外照應女性，造成女性自身的不適感與罪疚感。

在「女」從軍者「擬男化」的努力下，由於「兵」預設爲男性，且並未因爲「女兵」或女性服務者的加入而挪移，「女兵」與「兵」們均認爲「女兵」應當朝「兵」靠攏，可是，生理條件以及社會條件的差異與認定畢竟存在，「女」與「兵」之間仍存在著不可避免的齟齬。

五、結　語

抗戰爆發後，上海曾出現過一份由大學女生主導的短命刊物《女兵》，[108] 創刊號編者序言中指出，該刊物自許的任務乃是領導大眾婦女、溝通全國婦女救亡工作、奠定持久抗戰基礎等；[109] 另一篇文章則提到，許多家屬不願男丁從軍，這是不明瞭救國就是救身所致，因此需得宣傳工作者去

例〉，頁 29-37。在這篇針對當前臺灣海巡與消防人員的研究中，仍可看到與謝冰瑩當年從軍類似的困境，且範圍更大，包含住宿、洗澡、如廁、育兒、兼顧家庭等等。

[107] 謝冰瑩，《新從軍日記》，頁 222-223。

[108] 為旬刊，共發行三期（1937 年 10 月 5 日-10 月 25 日），創刊號封面載明為「復旦大學留滬女生主編」。

[109] 〈小號角〉，《女兵》，創刊號（1937 年 10 月 5 日），頁 2。

曉以大義，「這樣的工作，由我婦女界的知識分子來擔任，比較適當，因爲用婦女去訪問家屬，用女子和女子談話，比較得容易收效」。[110] 該刊物從頭至尾不曾提及謝冰瑩，不過，編刊的女性顯然沒有當年謝冰瑩北伐從軍時「女」與「兵」的矛盾猶疑，直接認定「女兵」應當具備相當智識、不直接上戰場殺敵、視宣撫爲己任、擔當男性們的後盾，而不再做謝冰瑩北伐從軍時渴望的、從「女」改造爲「兵」的夢了。

從一開始報考軍校、參與北伐時，極力希望能將「女」改寫爲「兵」，經歷軍校、軍隊這一類全控機構的規訓，從外觀到精神均受改造，成爲服從軍隊權威與律令的軍中一員，到逐漸認同女性「應當」成爲「女兵」，甚至是「適合」成爲「女兵」──女性從軍應從事符合其身心天性的相關工作，對戰爭幫助更大。抗戰時期，謝冰瑩的身分雖然不是「女兵」了，工作性質上卻似乎相去無幾，「女」在「兵」的隊伍裡仍舊應當負擔適合「女」的工作。不過，前線的臨場性與刺激性，畢竟是震撼的，「回到兵站，聽得大砲的響聲非常熱鬧，心情已由害怕轉變到緊張了。李科長告訴我，敵人就在離此地只有三十多里的地方向我猛攻。他奇怪我爲什麼跑去常州又轉來。一般人都以爲女人是膽小的，聽到砲聲就往後跑，而不知我是最高興在槍林彈雨裡生活的」。[111] 女人並不膽小，也可以吃苦，也能身處前線、戰地，充分發揮女性所長報效國家，應是謝冰瑩軍旅寫作中著力強調的；可是，在她所自豪的前線生涯自述裡，卻一再不自覺地透露：軍隊計較的乃是女兵作爲政治工具的最大效度，欲發揮功

110 緊迫，〈火線後面──新起的一重愁雲〉，《女兵》，創刊號，頁 13。
111 謝冰瑩，〈暴風雨中去無錫〉，《新從軍日記》，頁 271。

能，就必須充分應用「女」的特質。

《新從軍日記》裡，謝冰瑩曾記述過一自殺事件：「這家的主人姓莊，有個十八歲的女孩，因爲國難嚴重而自殺死了。照片上有人替她題了許多詩，看語氣是她哥哥。每個團員看了都感慨地說：『爲什麼不留著一條性命和日本鬼拼呢？有勇氣自殺，爲什麼不去殺敵人？』」[112] 爲了國難而自殺，是認爲國家前途迷茫，不如求死，還是因爲不堪憂愁負荷，乾脆自我了結？文中描述簡略，但是謝及其同袍認定她是白白犧牲了：有赴死的勇氣，何不用於殺敵？自殺反而是沉浸在「傷她悶透」(sentimental)情境下的產物。如同謝的二哥勉勵她從風花雪月的陰性表現中超拔出來，邁向陽剛，泯除個人，投向團體，奉獻給公共或國家事務，才能與「新文學」、「覺悟」的革命未來相契。

確實，謝冰瑩投向軍隊，自覺改造，在其三部標舉「從軍」、「女兵」的散文著作中，呈現出接受軍隊紀律生活、廁身救國熱潮、願意融入「兵」角色的強烈意願；「女」性特質該不該保留，端視其是否能在戰爭中被工具化。在接受了多次且多元女性主義洗禮的今日看來，自命進步的謝冰瑩或許沒有發現，她的婦女解放其實是以壓抑「女」、將「女」次等化來實踐的。然而，如何理解性別角色，還是受到時代的限制。歷經過「女」與「兵」的種種糾葛，渴望去「女」成「兵」的謝冰瑩，最終仍肯認了性別化的勞動配置。如同何香凝在 1937 年贈與謝冰瑩的詩：「征衣穿上到軍中，巾幗英雄武士風；錦繡河山遭慘禍，深閨娘子去從戎。」[113] 縫

112 謝冰瑩，〈莊小姐自殺〉，《新從軍日記》，頁 281。

113 轉引自梁兆斌，〈不能忘卻的謝冰瑩〉，閻純德、李瑞騰編，《女兵

製征衣本是婦女支持男子上前線、做好後盾工作的象徵，在詩中卻變成女子自己穿上征衣從軍去；女性自深閨走出，從戎拯救河山，而河山以錦繡織物來譬喻，雖然是常見詞彙，放在這裡卻再度凸顯了：女性不在深閨裡從事女紅了，她走向外界，走向軍中，等待縫補的對象從衣服變成了河山；雖然具備「武士風」，卻仍然與從事縫補的形象（家務勞動的公共化）聯繫在一起。

謝冰瑩》，頁 11。

徵引書目

一、報刊

《一四七畫報》（北平），1946。
《女兵》（上海），1937。
《中國軍人》（廣州）， 1925。
《中華》（上海）， 1937。
《天文臺》（香港），1941。
《宇宙風乙刊》（上海），1939。
《青海》（上海），1929。
《春潮》（上海），1929。
《革命軍日報副刊》（漢口），1927。
《婦女雜誌》（上海），1920。
《開明》（上海），1931。
《戰時教育旬刊》（上海），1937。
《禮拜六》（上海），1947。
《讀書月刊》（上海），1931。

二、專書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朱嘉雯，《追尋漂泊的靈魂──女作家的離散文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邢照華，《黃埔軍校生活史 1924-1927》。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周芬伶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4．謝冰瑩》。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
范銘如，《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章培恒、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許楊清、宗誠編，《丁玲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陳三井編、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舒揚主編，《黃埔軍校研究．第三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
劉繼增、毛磊、袁繼成，《武漢國民政府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閻純德、李瑞騰編選，《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八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
謝冰瑩，《女兵自傳》。臺北：力行書局，1956。
謝冰瑩，《女兵自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
謝冰瑩，《抗戰日記》，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初版，1988 再版。
謝冰瑩，《我的回憶》。臺北：三民書局，1969。
謝冰瑩，《從軍日記》。上海：光明書局，1932。
謝冰瑩，《新從軍日記》。漢口：天馬書店，1938。

顧秀蓮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婦女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8。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Gilmartin, Christina Kelley.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Goffman, Erving.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Y.: Anchor Books, 1961.

三、論文

李夫澤，〈論謝冰瑩的《女兵自傳》〉，《湖南社會科學》，期 1，2003，頁 125-127+64。

周春燕，〈婦女與抗戰時期的戰地救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4，2014 年 12 月，頁 133-220。

周海娟，〈從「巾幗英雄」到「職業婦女」：我國女性在軍隊中角色的歷史變遷〉，《東吳歷史學報》，期 16，2004 年 6 月，頁 149-185。

林孟君，〈論謝冰瑩的性別主體與文學創作〉。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柯惠鈴，〈軼事與敘事：左派婦女回憶錄中的革命展演與生活流動(1920s-1950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141-160。

徐小玉，〈《從軍日記》、汪德耀、羅曼羅蘭〉，《新文學史料》期 4，1995，頁 88-98。

張堂錡，〈論謝冰瑩的左翼思想及其轉變〉，《淡江中文學報》，

期 32，2015 年 6 月，頁 283-311。

彭渰雯等著，〈女性在陽剛職場內的樣板處境：以海巡與消防單位爲例〉，《東吳政治學報》，卷 27 期 4，2009 年 12 月，頁 115-169。

欽鴻，〈謝冰瑩一九三八年抗戰日記片斷〉，《新文學史料》，期 4，2010，頁 169-180。

劉嘉谷，〈謝冰瑩研究札記〉，《中國文學研究》，期 1，1987，頁 108-113。

劉寧元，〈抗日浪潮中的北平婦女抗日組織〉，《北京黨史》，期 5，2005，頁 10-13。

錢淑芬，〈國軍軍事院校「軍事社會化」之研究〉，《復興崗學報》，期 49，1993 年 6 月，頁 333-364。

錢淑芬，〈「穿制服的人」與制度化作用：軍人角色模塑的理論性探討〉，《復興崗學報》，期 99，2010 年 9 月，頁 45-80。

錢淑芬，〈全控機制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化：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初官養成教育的模塑制度爲例〉，《復興崗學報》，期 103，2013 年 12 月，頁 147-174。

Becoming A "Female" Soldier: A Study of Xie Bingying's Military Career Essays

Chia-hsien Yang *

Abstract

Xie Bingying（謝冰瑩）was among only few female writers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ho really held a military career. Her first-hand frontline experience was part of her abundant inspiration for writing. As a woman of the new era, she left home and strived for finding her love relationship freely and getting education. She deliberately chose to join the military, which traditionally was considered to be exclusively for male, and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ntry or even the people, as a figure of "female solider"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The essay is on three books: War Diary（從軍日記）written during Xie's participation as a regular Nationalist soldier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New War Diary（新從軍日記）written during her organization of Hunan Women Battlefield Service Corp., and A Woman Soldier's Own Story（一個女兵的自傳）published between two duties and considered to be somehow autobiographical.

While women join military or engage frontline service, does it mean that the status of the gender is raised? Th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ilitary is a total institution that is isolated from others. The members in it go through unified, repetitive, and group daily routines, under authoritarian control, prearranged schedules, policy-controlled outfits and bodies, and undergo re-socialization. Hence, a member only could obey and fit in the institution, and there was no exception for female soldiers. Thus, once accepted same training, female soldiers were still thought to only fit for pacification and nursing assignments, not to be fighting on the battleground frontline. The male-personification of military training could not rewrite the gender-division; in the other words, a "female soldier" was an extension into the public sphere from the female's role in the private sphere, only to make the domestic labors public.

With the strong identification of military image aiming to eliminate enemies, and to save the country, Xie'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of military career, from the beginning, the biological identity of "female" had been crushed by the self-forging of identity of "solider." Everything considered as part of "female" identity was eliminated for good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solider" identity fulfillment. The love desiring body and the state loving body were mutually exclusive. At the same time, when a female entered the military, a muscular territory, not only daily life suffered; further,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al strength and health would have made a "female soldier" even lesser than a conventional sense of "soldier."

Is having women in the military liberating or under a discipline? After experiencing the complicated matters of being "female" and "soldier," Xie wished to strip "female" from the "soldier" identity. In fact, whether the "female"

character should remain, it depended on if it could be utilized in the war time. Ultimately, she recognized that she was only a "female soldier" which was still different from a "soldier."

Key Words: Xie Bingying, woman soldier, total institution, gender consciousness, Northern Expedition, Second Sino-Japanese War